

政治策略与社会联盟

——英国 19 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

王铁军◎

【内容提要】 本文从政治策略与跨国社会联盟的角度讨论英国 19 世纪贸易政策的历史发展，认为英国在资本主义的先发优势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策略与社会联盟导致其单边自由贸易策略的出台，而 19 纪末期先发优势的丧失又产生了具有更多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政治策略与社会联盟是英国影响欧洲大陆国家贸易政策的重要途径，为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忽略。19 世纪中期，英国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与欧洲大陆各国的土地贵族结成了支持国际自由贸易秩序的奇特联盟，但后者无法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真正动力。而当欧洲大陆国家的资产阶级成长壮大并支持自由贸易时，英国却因竞争而转向保护主义。先发优势、政治策略与社会联盟是展现英国 19 世纪贸易秩序的新视角。

【关键词】 自由贸易政策 政治策略 社会联盟

英

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许多学者相信，19 世纪的英国也是一个与 20 世纪的美国类似的“霸权国”，由于英国的“霸权期”已经“终结”，其“完整的形态”可以为思考当今

* 本文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课题“世界经济、关税与帝国沉浮”的资助。

的国际秩序提供重要的启示。^① 然而，学术界对英国作为 1815—1914 年国际经济霸主的历史分析才刚刚起步，^②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英国霸权的研究也大多关注霸权国是否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物品并创造了稳定的秩序，即霸权国与体系的关系问题。

本文拟从政治策略与社会联盟的角度考察英国 19 世纪贸易政策的历史发展，时间跨度为从 1846 年《谷物法》的废除开始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文章认为，英国在资本主义的先发优势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策略与社会联盟导致其单边自由贸易策略的出台，并对欧洲国际贸易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 19 世纪末期先发优势的丧失又使英国产生了具有更多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所谓先发优势不仅仅表现为工业革命所唤醒的经济力量，更重要的是英国较早地改组了国家机器的形态，并通过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所形成的国际利益链与后进国家的传统统治阶级建立同盟，压制后进国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成长，客观地塑造了 19 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英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目的既不是谋求共同繁荣，也不是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产品，而是阻挠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其结果并没有促进国际体系中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发展。通过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功地“干预”了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策略与社会联盟，使欧洲各国保守的统治阶级参与到英国创始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当中，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力量的同盟者。它们一方面对国内资本和劳工做出一定的让步，维持着反民主的贵族保守主义统治，另一方面分享着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红利。欧洲后发展国家的资本主义也不是英国先发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在“赶超”英国方面，它们与本国的贵族保守势力目标一致，支持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反对英国倡导的国际自由贸易秩序，追求具有地缘政治含义的战略目标。

① David Lake, "British and American Hegemony Compared," in Micheal Fry ed., *History, The White House and Kremlin: Statesman as Historians* (London: Pinter Pub Ltd., 1991), p. 107.

② R. McKeown,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19th Century Tariff Level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7, No. 1, 1983, pp. 73-91.

一 从重商主义到单边自由贸易 (1776—1846)

(一) 英国的重商主义时代

在重商主义时代,为确保英国产品的出口,英国统治者主要使用武力威胁、外交说服和签署互惠贸易协定等方式进入国外市场。从 17 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就竭力反对重商主义思想,但直到 19 世纪中期,政治家及其顾问依然在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和外国竞争对手谈判。^① 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从 1783 年到 1787 年,小皮特及其部长们与欧洲列强展开了一系列的商业谈判,在严格互惠和双边主义的基础上对进入英帝国的商品限制做了让步。这些商业谈判是外交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抵制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扩大对欧洲的影响。^② 1783—1793 年,英国财政部为了打击走私和增加海关关税,削减了大部分关税。^③ 在镇压美洲殖民地的叛乱失败后,英国在欧洲范围内遭到孤立,汉诺威王朝几乎不具备建立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所需要的外交权威和军事力量。^④ 1793—1815 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封锁、高进口税、政府支持的私掠、海军战争费用上升等都大大限制了国际贸易。^⑤ 英国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1805 年和 1812 年,英国先后取得对法国和美国海军的决定性胜利,成为 1815 年《维也纳条约》签署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凯文·H. 奥卢

① J. 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ondon: Allan and Unwin, 1955).

② D. B. Horn,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③ P. K. O'Bri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Taxation, 1660 - 1815,"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1, Issue 1, 1988.

④ I. Christie, *Stress and Stability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6.

⑤ P. K. O'Brien,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on the Long-Run Growth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798 - 1815," *Review*, Vol. 3, 1989.

克 (Kevin H. O'Rourke) 也认为, 早在 1915 年英国就像在 1846 年、1860 年那样权势显赫了。^① 不过, 卡斯尔雷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推动更自由的贸易制度。相反, 在维也纳会议上几乎没有讨论贸易问题, 卡斯尔雷关注的是传统的安全、边境和王朝, 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防止法国再度侵略的均势体系。^② 甚至有学者认为, 英国 1846 年的霸权地位 (包括经济实力和财政制度的相对优势、海上优势以及在欧洲协调中的至高地位) 根本没有改变 30 年前的经济外交策略。^③ 英国工业革命在欧洲和美国高度保护主义的背景下继续前进, 没有受到阻挠。然而, 为了获得其他国家对于英国出口和运输的让步, 英国政府支持了小皮特的双边互惠贸易政策, 在 1823 年放弃了传统的重商主义。尽管英国与普鲁士、法国、奥地利、瑞典、汉萨同盟、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和希腊签署了双边贸易条约, 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保留了帝国特惠制, 对全面降低关税水平并不迫切。

(二) 重商主义的终结与单边自由贸易的开始

自 1824 年威廉·赫斯钦森 (William Huskisson) 改革到 1849 年《航海条例》的废除, 英国步履蹒跚地转向了自由贸易。但 1824 年的关税仍然很高, 平均税率为 50% 左右, 直到 1836—1840 年才缓慢地下降到 31%。1840 年《进口税选择委员会报告》 (*The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mport Duties*) 指出财政政策目标和针对进口的保护主义政策目标明显不一致,^④ 由此导致《1841 年墨尔本法》、1842 年和 1845 年《皮尔法》和 1846 年《谷物法》的废除。整个关税系统的改革是财政策略调整的一部

① Kevin H. O'Rourke, "British Trade Policy in the 19th Century: a Review Articl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2000, p. 834.

② C. K. Webst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1812 - 1815* (London: Penguin, 1931).

③ B. Hilton, *Corn, Cash and Commerce: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ory Governments, 1815 - 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④ A. Imlah, *Economic Elements in the Pax Britann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46.

分,目的是维持大多数公共预算的盈余。^①在决定重新征收所得税确保收入来源之后,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就着手削减关税,到1845年年底将1146项关税削减至仅存很小一部分。^②

英国转向单边自由贸易的标志性事件是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1815年颁布的《谷物法》允许谷物的进口与仓储,但只有在英国国内粮价高于每夸特80先令时这些进口谷物才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③1814年,小麦价格74先令,1815年下降到52先令。在以后的7年里,《谷物法》实际上关闭了英国市场。英国的土地所有者支持该法,而政治经济学家和制造业工业家则强烈反对。1822年,英国将标准降低到70先令,1828年再度降低。在棉纺织工厂主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的领导下,反谷物法联盟成立了。作为土地阶级代表的托利党传统上支持农业保护,辉格党则支持更自由的贸易。

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是英国国内一系列政治斗争的结果。1837年的经济萧条触发了社会抗议浪潮。反谷物法联盟在科布登和布赖特等人的领导下大力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宣称自由贸易会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由于反谷物法联盟的核心成员棉纺织工业家在地理分布上高度集中便于组织,并与范围更大的出口工业区选民结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因而效率极高。^④此外,土地所有者的立场产生了分化,许多贵族地主从事非农业活动,减弱了他们对关税的支持。反谷物法联盟是自由贸易的支持力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为什么是作为托利党党员的皮尔废除了《谷物法》?

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认为,自英国内战时期开始,商业利益就与土地财富互相渗透,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决策集团的基础。但到18世纪后期,这一旧的统治集团却坚决反对促进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⑤

① N. Gash, *Aristocracy and People, Britain, 1815–1865* (London: Arnold, 1979), p. 39.

② Imlah, *Economic Elements in the Pax Britannica*, p. 48.

③ J. G. Williamson, "The Impact of the Corn Laws Just Prior to Repeal,"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7, 1990, pp. 123–56.

④ Cheryl Schonhardt-Bailey, *The Rise of Free Trade* (London: Routledge, 1997), Vol. 4, p. 287.

⑤ 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第80、81、90页。

《谷物法》的废除和 10 小时工作日的确定标志着新的国家权力形态的形成。考克斯认为，科布登呼吁建立中产阶级的统治，而皮尔却重新树立了贵族的霸权。《谷物法》的废除使贵族顺利地恢复了英国的自然领导人的地位，同时也消除了动员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主要理由，使它心无旁骛地重操其赚钱活动的天然旧业。为了安抚工人阶级，贵族统治阶级在按照自由主义经济的要求管理国家的时候，可以在不破坏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对工人做些让步。考克斯指出，在首相皮尔的领导下，贵族设法获得了制造业中产阶级的同意并安抚工人阶级，1847 年 10 小时工作日立法之后，宪章运动日渐式微并烟消云散了。在贵族阶级的统治下，资产阶级取得了对社会的支配地位，掌握了霸权。^① 这些立法措施与 1846 年《谷物法》的废除一起形成了一个既避免对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又确保自由市场、健全货币、低通货膨胀率和（在金本位下）固定汇率的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并一直维持到 19 世纪末。

但欧佛比克（Overbeek）则认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能够取代贵族成为霸权性的阶级”。^② 他认为，英国的工业优势在 19 世纪的后半期就开始了长期下降的趋势，因此一定是土地、商业和金融贵族维持着统治地位。^③ 对于为什么会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欧佛比克的回答是，自 1688 年起，金融和商业贵族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是现有的统治集团重新调整了政策。^④ 但究竟是哪一种社会力量促成了向自由贸易和自由国际主义的转变，上述所有理论都没有对此做出明确回答。实际情况是，19 世纪上半期英国生产资本和制造业精英的出现的确十分重要，但尚不具备主导地位，结果是旧的国家组织方式得以延续。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

① 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第 96 页。

② Henk Overbeek and Kees van der Pijl, eds., *Restructuring Hegemon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Neo-Liberalism in the 1980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30 – 31.

③ Henk Overbeek and Kees van der Pijl, eds., *Restructuring Hegemon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Neo-Liberalism in the 1980s*, p. 41.

④ Henk Overbeek and Kees van der Pijl, eds., *Restructuring Hegemon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Neo-Liberalism in the 1980s*, p. 112.

史意义在于,为了适应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保障新得到选举权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英国国家机器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通过经济竞争和政治妥协,土地、金融、商业和工业利益集团的分歧得到了解决,但并没有妨碍作为其统治底色的整个资本主义秩序。^①

因此,19 世纪中期英国的发展历程使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任何特殊资本利益集团上升到了主导地位。面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自下而上的剧烈动荡及其明显的不公平现象,英国统治阶级通过制度建设应对这些挑战并成功地实现了稳定。其中,《谷物法》的废除特别重要,这是缓解资本与劳工冲突进而实现劳资妥协的重要手段。在反谷物法的斗争中,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结成了同盟,将斗争矛头指向土地贵族。科布登和布赖特的演讲充斥着反对土地贵族的情绪,宣称自由贸易会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反谷物法联盟曾做出承诺,即使无法给予工人阶级选举权,也会帮助其提高生活水平,从而削弱了劳工对宪章运动的支持。很多政治经济学家担心反谷物法联盟将自由贸易当成了阶级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问题。^② 在 1846 年法案审议过程中,皮尔明确表示,他希望“消除王国臣民们不同阶级间嫉妒和不满的根源”。^③ 为了安抚土地贵族,皮尔也取消了一些制造业享有的保护、答应循序渐进地改革、向农业提供低息贷款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废除 1846 年《谷物法》对国内政治的重塑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 英国转向单边自由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内涵

在英国决定转向单边自由贸易之时,在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资本主义要么尚未萌发,要么尚未被社会所接受。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欧洲大陆国家才试图通过“国家建设”应对类似的挑战,但其国家治理形式和

① 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p. 260, 283.

② Cheryl Schonhardt-Bailey ed., *The Rise of Free Trade*, Vol. 2, p. 82.

③ Cheryl Schonhardt-Bailey ed., *The Rise of Free Trade*, Vol. 2, p. 63.

政策结果深深地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因而其做法大大不同于英国。^①

面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先发优势，恰恰是贵族的主导地位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霸权，保证了欧洲国家被纳入英国所希望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当中。普鲁士就是这样的国家。它向英国供应食品和原材料并成为英国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销售市场。也正是在普鲁士的土地贵族当中，自由贸易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因为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普鲁士容克阶级的物质再生产依赖于向英格兰出口粮食、羊毛和木材的能力。许多普鲁士贵族倡导亚当·斯密的思想，鼓吹自由贸易和最小的国家干预。普鲁士政府不愿意用提高进口关税的方法保护其幼稚工业，而这正是普鲁士的制造商及其思想代言人如李斯特等人不断抱怨的问题。

从 1818 年起容克地主就支持普鲁士贸易的开放，一直到 1873 年爆发农业生产过剩危机时才有所改变。^② 1818 年，普鲁士采用低关税政策，并通过关税同盟将其扩展到整个德国，并压制着来自相对较新的大型纺织、钢铁行业和传统的小商业阶层的保护主义压力，反映了国家机器中贵族的利益及其影响力，也反映出对英国农业贸易在其国家税收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③ 19 世纪 20 年代的农业大萧条对普鲁士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④ 为容克阶级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和物质再生产创造了条件，并使他们承受住了中产阶级的革命压力。相比之下，莱茵兰的许多企业家很早就寻求保护关税，避免与英国的竞争。^⑤ 虽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业资产阶级”，但很明显存在着制造商利益，他们长期抱怨政府的自

① Jeremy B. R. Green,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nd the Anglo-German Prelude to WW1,"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ch 17, 2011.

② Karl Erich Born, "Structural Changes in Germa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ames Sheehan ed.,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6), pp. 18 - 19.

③ William R. Le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1, No. 3, 1988, p. 354.

④ Robert Berdahl,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ervative Ideology, 1770 - 184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66.

⑤ Sidney Pollar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6, No. 4, 1973, p. 641.

由放任策略。普鲁士容克与反对保护幼稚工业、支持自由贸易的城镇自由派结成了同盟。关税同盟于 1853 年迈向关税自由化,并在 1850 年与奥地利签订了商业条约。普鲁士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经济增长推动了自由贸易事业,但普鲁士政府贸易自由化的能力受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限制,因为加入关税同盟已经割让了可观的经济主权。^①

这样,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在英国是制造业资产阶级,而在普鲁士则是土地贵族。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顶峰,另一个则才刚刚开始向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过渡。这远不是考克斯所说的产业资本家在各自国家建立统治权的同步发展,而是不同的国家—社会复合体临时的互补。正是这种临时性的互补确保了 19 世纪中叶国际经济关系世界性“和谐”的可能性。至少对于普鲁士而言,英国单方面转向自由贸易加强了土地要素的势力。

在法国,是农民而不是贵族承担了大多数农业生产,利益的混合甚至比普鲁士更复杂。然而,社会压力最终没有对法国政策提供决定性的推动。金德尔伯格指出:“法国在缺乏足够强大的出口利益的情况下,运用自由贸易对付分散不同的利益。在不缺乏强有力的出口利益的情况下,用混合经济理论自上而下地推行。”^② 由于国内工业发展不充分,需要大规模的进口。在法国建立一个铁路网络是引起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支持这个政策的投资者可以从中得益。由于确保法国酒以低关税进入英国市场,英国自由贸易政策也得到了生产者和销售者游说集团的支持。^③ 这些投资者和游说集团遭到了第二帝国之前和之后都支持保护主义的绝大多数的工业家、农业家、工人和农民的反反对。^④

① W. O. Henderson, *The Zollverei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0).

②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n Western Europe, 1820 – 187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1, 1975, p. 41; Herman Lebovics, *The Alliance of Iron and Wheat in the Third French Republic, 1860 – 1914: Origins of the New Conservati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4.

③ John Nye, “The Myth of Free Trade Britain and Fortress France: Tariffs and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1, No. 1, 1991, p. 36.

④ Herman Lebovics, *The Alliance of Iron and Wheat in the Third French Republic, 1860 – 1914: Origins of the New Conservati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二 英国外交与开放贸易制度的扩散（1846—1870）

在 19 世纪 40 年代之后 25 年里，英国登上了世界经济的巅峰，成为“世界工厂”。科布登等人大力宣扬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可以将各个国家捆绑在相互贸易的网络中并制止战争，因此自由贸易是国际体系的基石。19 世纪 50 年代，欧洲各国甚至美国的关税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1853 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再度恢复粮食进口关税，但降低了工业品关税。1856 年，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开始考虑贸易自由化，之后下调了关税。1847—1851 年，荷兰废除了《谷物法》和《航海条例》。1851—1855 年，瑞士、比利时、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降低了关税。1857 年，美国将关税降至 19 世纪的最低水平。那么，英国的权力、榜样和观念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梳理历史档案和外交文件，但这个工作历史学家还没有做，^① 所以只有一些二手文献。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英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法国。在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希望与法国实现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但没有成功。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贸易保护主义在法国社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得到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主要是第二帝国领导人米歇尔·谢瓦利埃（Michel Chevalier）等。英国废除《谷物法》后，法国的自由贸易者在政治上仍然是少数，其政治活动直到第二帝国建立以后才变得重要起来。由于英国政府反对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北部以及萨福依和尼斯的安排，为了缓解压力，1860 年拿破仑三世与英国签署《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试图通过牺牲某些经济利益来实现法国内政外交的目标。^②

《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在英法两个国家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

① J. Clarke, *British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1782 - 1865*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② A. A. Iliasu, "The Cobden-Chevalier Commercial Treaty of 1860," *The History Journal*, Vol. 14, No. 1, 1971, p. 70.

英国是在自由贸易者中进行,在法国则发生在自由派和保护主义者之间。^①自废除《谷物法》以后,英国的许多自由贸易者开始相信,国家之间不受约束的商业天经地义,一旦英国把它自己的政策付诸实施,其他国家将很快效仿。^②但单边自由贸易信徒(包括格莱斯顿和科布登)认为,《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做法是一种走向双边主义的倒退。单边自由贸易在英国仍然很受欢迎,因为它被视为 19 世纪中叶以来贸易和工业增长的基础。^③在此后 10 年,《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成为重塑欧洲贸易关系的蓝本,通过环环相扣的网络,平均关税水平下降了约 50%。英国为了坚持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将给予法国的关税削减扩展到所有国家,但条约并没有要求法国做同样的事情。《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以英国式的单边自由贸易方式和法国式双边主义迅速影响整个欧洲。英国在条约中设定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成了新国际贸易体系的基石,并在 19 世纪 60 年代或多或少地成为欧洲其他国家效仿的例子。

拿破仑三世本人对英国坚持单边贸易政策,为欧洲树立“道德楷模”的做法不以为然。法国不愿通过单边最惠国政策开放市场,第二帝国拒绝英国的榜样,寻求通过双边条约获取法国的国家优势。转向自由贸易是法国威权主义经济现代化的一部分,目的是加强法国的商业、金融和殖民地位,并安抚工人阶级。但是工业增长受到自由贸易的阻碍,工业资本主义的利益似乎被牺牲了。尽管最终转向了自由贸易,但法国的官方政策并不支持自由放任和自由国际主义。

除了降低食品、原材料和机器的价格外,法国关税改革的目的是将其工业置于国际竞争的刺激下。法国关税委员会对法国和英国制造商的生产成本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大部分商品上法国关税为 10%—15%,足以对

① T. Kemp, “Tariff Policy and French Economic Growth, 1815 – 1914,”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 la Banque*, Vol. 12, 1976.

② N. McCord, *Free Trade: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Adam Smith to Keynes* (Newton Abbot: David and Charles, 1970).

③ Albert H. Imlah, *Economic Elements in the Pax Britannica*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法国工业提供保护，但不足以让它们经受国际竞争。^① 法国追求的后工业化战略遭到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反对，而金融资本从来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总之，在普鲁士和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并不是唯一的领导阶级，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领导阶级。

这样，英国的地缘政治目标、自由思想的外传和自身商业政策的榜样影响了欧洲大国的贸易政策。在 1846 年至 1870 年间，一些欧洲国家的工业化刚刚起步，交通和通信革命仍在进行之中，英国行使了不同于传统帝国的间接性和结构性权力。其在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做法似乎加强了如下结论，即英国政府的行动和例子在那些年里实质性地修改了国际经济秩序，自由贸易的框架出现了。英国单边贸易自由化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荷兰和准备统一意大利的加富尔。^② 除了自由贸易之外，更一般性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也从英国扩散到整个欧洲。在这种思想气候之下，19 世纪 50 年代，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和瑞典都废除了贸易禁令和保护主义措施。但是，英国没有引领欧洲大陆国家走向一个自由的国家—社会模式。相反，通过对初级产品提供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英国反而强化了欧洲旧制度国家的国内阶级结构，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远没有上升为决定性的力量。结果，欧洲国家以从属的地位被纳入英国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之中，成为英国工业的供应商。

三 单边自由贸易与新重商主义的回归（1870—1914）

然而，英国理想中的自由贸易体系并没有维持多久。如前所述，其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无法有效地维持贸易体系的开放。一旦遭遇经济危机或者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关系得以调整，自由贸易秩序就会遇到严重的挑战。

① Bryan Coutain, *The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Provision of Trade: Institutional Forms and the Content of Commercial Cooper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1860 – 1995*,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5, p. 265.

② G. Toniolo, *An Economic History of Liberal Ital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14.

1870 年德国统一后,工业化、社会改革及帝国间的竞争使欧洲出现了保护主义的回潮。尤其是在 1873—1896 年的大萧条中,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农产品价格下降,民主化产生了民粹主义压力,特别是在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燃起了经济民族主义之火。维也纳会议以来形成的欧洲均势变得不稳定,欧洲许多国家的军费开支和税收不断增长,保护战略工业的要求此起彼伏,^①一系列的关税战爆发了。更严重的是,在 1877 年至 1892 年间关税大幅提高。西班牙和俄罗斯在 1877 年、意大利在 1878 年、德国在 1879 年、法国在 1882 年和 1892 年关税先后上涨,农产品关税比工业关税上升更快。

英国出现了要求贸易保护的声音。1881 年,国家公平贸易联盟成立,反对外交部的单边自由贸易立场,支持关税互惠政策并要求对提高英国出口商品关税的国家施加报复。出于政治原因,国家公平贸易联盟拒绝自称保护主义者,但其的确支持对工业制成品进口施加温和关税,支持帝国特惠制。在自由贸易者的强大压力下,约瑟夫·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 最终于 1904 年放弃了对农业和工业进口施加 10%—20% 关税的帝国特惠计划。^②阿瑟·贝尔福 (Arthur James Balfour) 于 1903 年提出了较为温和的关税改革计划,将关税作为恢复自由贸易、报复反补贴行动的筹码。^③

贝尔福代表了一条中间道路,即虽然坚持自由贸易,但承认单边开放市场做法的失败。^④关税改革者认为,英国的自由贸易立场已不再适合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的世界经济。他们援引李斯特的观点,声称英国采取自由贸易是权宜之计,而不是原则。^⑤历史学家休因斯 (Hewins)、坎宁安 (Cunningham) 和阿什利 (Ashley) 很赞赏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

① P. A.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 - 189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8, 1977, pp. 281 - 313.

② P. Fraser, "Unionism and Tariff Reform,"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 No. 2, 1962. pp. 149 - 166.

③ A. J. Balfour, *Economic Notes on Insular Free Trade* (London: Longmans, 1903).

④ M. Egremont, *Balfour* (London: Phoenix Giant, 1980).

⑤ P. J. Cain, "Political Economy in Edwardian England: The Tariff Controversy," in A. O'Day ed., *The Edwardian Age: Conflict and Stability* (London: London Basingstoke, 1979).

他们都把自由贸易视为英国贸易政策的一个插曲或一个阶段。^① 关税改革者似乎比前几代知识分子更自觉地意识到了地缘政治和经济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政策建议试图处理现实政治和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关系。^② 与以前一样，在这里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改革者曾经认真考虑英国有责任为世界经济整体维持一个开放的贸易体制。即使是号召为了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维持自由贸易的贝尔福，其目的也是要将保守党团结在一起。^③ 由于张伯伦没有在议会和选举中吸引到足够的支持，关税改革运动最终失败了。而由于没有提出一个使自由贸易者和关税改革者都能接受的妥协性纲领，贝尔福也没有成功。^④ 同时，大英帝国不肯建立帝国特惠制。事实上，各自治领的商业政策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它们欢迎英国市场对其出口保持开放，而它们则对从英国进口设立保护主义关税。^⑤ 由于自由党和一些保守党的工会会员、城市和金融界、出口产业（棉花、煤炭、造船等）、工人阶级、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凯尔特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盟，单边自由贸易仍然被视为国家利益并维持了下来。^⑥

在英国，人们仍然认为，自由贸易意味着便宜的食物和低货币工资；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促进工业和农业的效率，有效降低了政府腐败；自由贸易也有特别的战略优势，可以引起外国对庞大的大英帝国的忌惮，因此能够减少帝国的防御成本。英国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认为，引进帝国特惠制会导致帝国内部各国特别是白人自治领之间的争吵。1906年自由党赢得大选后整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一战之后。单边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经久

① J. C. Wood, *British Economists and the Empire*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3).

② M. Beloff, *Imperial Sunset, Vol. 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③ A. Sykes, *Tariff Reform in British Politics, 1903 - 191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④ M. Balfour, *Britain and Joseph Chamberlai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5).

⑤ B.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 1983* (London: Longman, 1984).

⑥ K. Fielden,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 Trade," in C. J. Bartlett ed., *Britain Pre-Eminent: Studies of British World Influ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9).

不衰的意识形态之一，在合理性消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继续盘踞在大众的头脑中。^① 人们乐于相信，大英帝国正在向世界传播文明，整个帝国奉行自由贸易对大家都有好处。^② 政治家的世界观是：自由贸易导致和平，关税报复破坏和谐。^③ 但贝尔福看到，英国只能通过互惠和报复，而不仅仅是榜样的力量来维持自由贸易。然而，贝尔福的意见并没有说服自由党，甚至在保守党内部都没有获得成功。尽管在关税问题上存在着激烈辩论，但从 1870 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政策几乎没有改变。

奥卢克 (K. H. O'Rourke) 认为，19 世纪晚期英国的决策者非常重视关税对工人生活水平的影响，即粮食税将降低工人工资，这成为其支持自由贸易的重要理由之一。宪章运动以及后来的工党也支持这种观点。现代经济学家同意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极大地有益于劳工。^④ 奥卢克和威廉姆森的研究指出，19 世纪晚期英国所有实际工资增长的一半来自国际运输成本的下降和廉价的食物。但对于欧洲其他国家，则情况并非如此。约瑟夫·张伯伦正确地指出：“所有殖民地的大多数工人都是保护主义者。而我并不认为他们都是傻瓜。”^⑤ 经济学理论认为，贸易对高工资国家如奥地利和低工资国家如英国的影响是不同的。谷物价格下降也意味着农业就业的减少。英国不需要安置大量的农业劳工，实际工资上升；而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谷物价格的下降则减少了实际工资。^⑥ 随着民主化的发展，关税对工人生活水平的影响也可以从一方面解释为什么英国坚持自由贸易而欧洲大陆则保护主义思想回潮。

① I. Drummond,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Empire, 1919 - 1939* (London: Allen & Unwin, 1973).

② A. P. 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59).

③ P. Kennedy, *The Rise of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 - 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0).

④ K. H. O'Rourke, "British Trade Policy in the 19th Centur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2000, p. 840.

⑤ Cheryl Schonhardt-Bailey ed., *The Rise of Free Trade*, Vol. 3, p. 391.

⑥ K. H. O'Rourke, "The European Grain Invasion, 1870 - 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7, No. 4, 1997, pp. 775 - 801.

德国是 1873 年危机后第一个以提高关税的方式来应对的国家。德国统一以后全面走向保护主义，首先是容克土地贵族。由于在与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和俄罗斯农产品的竞争中，德国农产品出口已经不占优势，但统一的德国市场依然可以吸收其产品。因此，容克地主竭力要求保护主义政策。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德皇和俾斯麦都支持自由贸易，但农产品价格暴跌后转向了容克地主的保护主义立场。^① 1873 年，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传统的和新的精英阶层、农业家和工业家为了换取关税而搁置了早期的对抗。工业家为了得到关税保护放弃了对容克的敌视和对宪政的要求；容克地主接受了更高的工业品价格，但得到了较高的食品价格；农民得到保护减轻了直接困苦；劳工得到了社会保险；军队得到了武器；钢铁商得到了合同。^② 保护主义大联盟形成了，并一直掌权到 1918 年。1879 年关税被称为帝国的“第二基础”。总之，德国既没有发展出一个自由的社会，也没有建立起一个自由的国家。工业革命促成了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成为德国摆脱英国自由贸易体制的契机。

19 世纪 70 年代，法国也走上了高关税的道路。与其他“后发国家”如德国和美国相比，法国的效率更低。贸易保护对重工业、高资本化工业和脆弱的产业有极大的好处，但运输商和成功的出口商则反对贸易保护。所有的法国农场都受到了 70 年代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冲击。大多数生产者集团趋向保护主义。1881 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第一个全面的关税法案，但保护工业胜过农业。1892 年的《梅利纳关税法》对工农业产品普遍保护，此后保护水平逐年攀升直到 1910 年达到顶峰。^③ 由于小生产者占据多数，国际政治的竞争迫使法国更加关注安全问题，尤其是国内食品安全和军事人力资源储备的问题，加上《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本身

① 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袁明旭、朱天飙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第 100 页。

② 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第 103 页。

③ J. H. Clapham,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4th edition.

只是上层人物磋商的结果，没有坚实的民众基础，保护主义力量很容易联合起来。其中，工业集团在要求贸易保护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

四 关于英国 19 世纪自由贸易政策的几点思考

通过上文的描述，19 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霸权”标准并不相符。它既不具备建立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所谓“实力”，也没有为世界秩序提供制度和公共产品，甚至都不具备这方面的意愿。

首先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中的局限性。霍尔蒂 (K. J. Holsti) 指出，19 世纪的欧洲大陆并不存在单一的霸权。此时的经济力量并没有直接转化为外交力量，大多数战争威胁与商业问题根本没有联系。^① 美国独立以后，英国在欧洲遭到孤立，汉诺威王朝几乎不具备建立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所需的外交权威和军事力量。^② 德国关税同盟对英国向欧洲的出口构成了极大威胁，从长远来看将排挤英国的工业品出口。而面对德国关税同盟的形成，英国无力遏制。用亨利·约翰·帕默斯顿 (Henry John Palmerston) 的话来说，就是“英国政府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力量阻止独立国家参与这样的安排，关于它们的相互贸易问题，最后由它们自己考量，以促进各自的利益”。^③

其次是英国与国际自由贸易制度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是英国行使霸权最重要的制度工具，英国 1846 年废除《谷物法》、1849 年废除《航海条例》是欧洲自由贸易时代的开始。但是也有些学者指出，几乎没有欧洲国家愿意追随这些法令，英国也无法

① 詹姆斯·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 36 页。

② I. Christie, *Stress and Stability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③ L. Brown,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Free Trade Mov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36.

强迫它们遵守这些制度。^①

虽然关于废除《谷物法》的目的存在诸多争论，但一般认为是为了确保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而不是善意的霸主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产品。英国开放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市场的目的是迫使或诱惑其他欧洲国家开放对英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口。不论是科布登式的自由贸易者还是保守党的怀疑论者，目的都是阻滞欧洲大陆的工业化，阻止经济竞争对手的出现。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认为，“贸易委员会的政治经济学家鲍令、雅各布、麦格雷戈将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减慢欧洲大陆发展制造业的手段”。^② 支持自由贸易的理由大致如下，英国市场的开放将向外国人提供购买英国出口产品的英镑，阻止或至少减缓欧美对手国家的工业化，并使外国政府相信英国的意图是为了所有国家的好处而奉行开放贸易政策的。^③ 露西·布朗（Lucy Brown）这样调侃道：“皮尔、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约翰·罗素勋爵（John Russell）或其他在19世纪40年代改革中扮演领导角色的人物的脑海中是否思考过英国在未来几十年为世界经济提供稳定、自由的经济秩序的想法呢？英国的政治精英和统治阶级似乎对即将天降其身的大任懵懂无知。”^④

英国单方面转向自由贸易既放弃了撬开欧洲市场的能力，又放弃了施加影响和报复的可能性。英国还主张关税自治，认为关税纯粹是国家内政，应该由每个国家的立法机关根据自身利益独自决定，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外在干预。^⑤ 布莱恩·科顿（Bryan Coutain）认为：“《谷物法》的废除

① Hobson, “Two Hegemonies or One?” p. 315.

②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n Western Europe, 1820 – 187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1, 1975, p. 33.

③ A. G. Hopkins and P. J. Ca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1750 – 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3, No. 4, 1980, pp. 463 – 490.

④ Lucy Brown,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Free-Trade Movement, 1830 – 184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58.

⑤ Brown,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Free Trade Movement*, p. 116.

不是英国霸权领导地位的标志。英国不但以关税自主的原则放弃了商业条约,以政治不干预政策放弃了使用武力打开欧洲大陆市场的手段,也放弃了使用友好说服的办法发挥霸权领导作用的手段。”^①“最重要的是,英国单边自由贸易和关税自主立场的矛盾表明,英国霸权下缺少制度建设,既没有排斥搭便车者,也没有防止英国的贸易伙伴后退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 1860 年的英法条约中,法国成为欧洲商业条约网络的主要建筑师,而后者与英国的偏好是相反的。”^②

上述做法表明,英国既不能也不愿谈判或实施互惠关税削减,无法将它的贸易伙伴纳入自由贸易的制度体系中。^③英国也无法制止搭便车的现象。戴维·莱克(David A. Lake)指出,美国在 19 世纪后半期之所以能够有恃无恐地大肆扩张出口并同时树立举世无双的高关税,原因就在于英国霸权的结构。“英国作为霸权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对美国贸易战略有两种内涵:首先,英国一般性地奉行自由贸易,但为了以榜样的力量发挥领导作用,它宁可接受外国的保护主义而不愿意采取报复的手段。这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安全地实施搭便车政策。由于英国的政策打消了对报复的恐惧,美国能够避开英国的竞争者,同时却有恃无恐地将一半的出口输往英国……”^④

最后,英国与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在 19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民众对于自由贸易的确十分痴迷,然而对于决策者而言,自由贸易的策略常常是与更广大的外交战略考虑结合在一起的。对自由贸易的执著也

① Bryan Coutain, *The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Provision of Trade: Institutional Forms and the Content of Commercial Cooper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1860 - 1995*, Doctoral Disser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5, p. 17.

② Hobson, “Two Hegemonies or One?” p. 315.

③ John Davis, “The British Sonderweg: The Peculiarities of British Free Trade, 1845 - 1880,”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8, No. 3, 1997, p. 197; Nicholas Onuf, “Hegemony’s Hegemony in IPE,” in Kurt Burch and Robert Denemark, eds., *Constitu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7), p. 105.

④ David A. Lak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Trade Strategy in the Pre-hegemonic Er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4, 1988, p. 40.

是时而积极时而消极，并非一成不变的。19世纪50年代，当法国希望与英国签署自由贸易条约时，英国非常不情愿，1860年被视为英国自由贸易干将的科布登竟然希望阻止法国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认为贸易的扩展将提高对英国劳动力的需求，加强工人阶级力量并增加动荡的可能性。^①随后，法国成为欧洲自由贸易条约网络的中心，它所倡导的最惠国原则成为制度特征。

由此可见，英国并不想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其政策意图也并非提供公益，更多的考虑是要维护私利，而自由贸易制度本身也并不能时时刻刻并一劳永逸地维护英国的利益。只要欧洲大国间存在着有意识的战略竞争，自由贸易就会是一个具有重商主义倾向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博弈。

在19世纪中后期，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自由经济的原则，那么，英国的权力、榜样和观念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墨菲认为，“英国对领导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政治运动最不感兴趣”。^②当然，即使主观上不想领导，在客观上也会产生领导的事实。考克斯认为，英国的均势政策恰恰发挥了这种作用，从而使欧洲接受了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霸权是通过均势实现国际化的，通过操纵欧洲的权力均衡，英国为自由思想和实践的普遍传播创造了条件。均势为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西欧国家资产阶级的自由转型清除了外部障碍物，使“西欧国家在采纳自由制度时获得了一个宽容的环境，没有遇到旧的复辟政权的干预风险”。^③然而这些说法并没有坚实的史实依据，也高估了英国控制均势和干预他国政治的能力。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显然站在复辟政权一边，坎宁政府虽然谴责神圣同盟的反动性，但并没有阻止旧制度对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和匈牙利自由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

① Timothy McKeown,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Nineteenth-Century Tariff Level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7, No. 1, 1983, pp. 73–91, 84.

② Craig Murph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Global Governance since 1850*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 39, pp. 78–79.

③ 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第85页。

五 结论

英国单边转向自由贸易对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生产体系和社会力量平衡的改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为欧洲大陆国家的保守政权实现“现代化”提供了路径,加强了反对政治自由化和快速工业化的社会力量。19 世纪中期英国历史地位的独特性在于,即使没有军事或外交掌控,先发优势也可转化为经济优势。英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的广泛联系与英国建构欧洲和大西洋经济关系基本无关。换句话说,即使无法在欧洲核心地区制定并执行相关的规则,英国也能够塑造世界经济。它这样做的能力在于能够对食品和非食品工业提供一个巨大的进口市场,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联盟,甚至影响它们对一般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定义。先发优势和市场开放策略所产生的这种客观影响并不是“霸权国”概念所能概括的,因而也不能套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

如前文所述,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生产体系的根本差异会使不同国家间阶级性质完全不同的团体建立“利益共同体”,甚至在表面上享有“共同的观念和价值”(如自由贸易),尽管这种价值观与其深层的政治哲学是严重冲突的。正是这种差异回答了下面的问题,即为什么英国具有掠夺性意图的单边自由贸易战略没有遇到寻求保护和推进本国工业化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抵制。答案就是,英国在 19 世纪中期具有历史的独一性。借助世界市场,英国的国内资本主义霸权发现它与欧洲大陆的君主和土地贵族有着某种利益上的结构联系。通过引导欧洲生产商追求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欧洲大陆的农业利益集团能够得到大量收益,进而增强它们的社会地位和它们所支持的保守的政治治理方式。在这种劳动分工中,英国制造商居于顶端。正是这些互补的发展中经济体构成了使欧洲自由贸易体系成为可能的“普遍的共同体”。

从表面上看,英国工业家和银行家、普鲁士容克地主和美国内战前的农场主一起被捆绑在这种跨国的社会联盟之中。但要注意的是,这一由不

同的社会力量构成的社会联盟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容克地主和拿破仑三世的确接受了自由贸易，但他们并不代表各自社会的“支配性”力量。这种国际安排所体现的“普遍性”的程度也远低于考克斯和欧佛比克所说的工业或商业跨国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的普遍性。

本文的分析表明，19世纪的英国对于当时国际秩序的作用方式与二战后的美国是极为不同的。此时的美国完全满足 IPE “霸权国”概念的标准。它将其盟友和前竞争对手整合到一个多边贸易和金融的框架中，将它们的经济融入一个开放的和扩大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重要的是，它试图按照自己的国家—社会关系形象重塑西欧和日本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基础。美国积极支持中间派、大西洋主义者政党和温和的工会，在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鼓励公司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工之间的妥协。^①

在美国霸权的结构中，我们不仅发现了主导国家的霸权施动力量，也发现了拥有类似社会目的的社会力量所组成的跨国利益集团，发现了主导国家在国内转型的基础上重新安排世界秩序，并通过对下属国家和社会力量做出让步获得共识从而形成国家群落的现象。在这里，社会霸权及国际霸权结合在一起。此外，为了维持主导国家和下属核心国家的国内稳定和加强其合法性，主导国家还倡导建立了世界经济秩序的治理机构。尽管在这样的秩序下武力和强制不会减少，^② 但与二战之前的世界秩序相比，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命令机制实现了真正的突破。

19世纪英国的例子表明，不能简单地把世界秩序看作主导国家社会秩序在国际层面的放大，历史上的所谓英美霸权之间没有可比性，将其进行类比妨碍了我们对英美历史独特性以及各自国际角色的理解。国际关系史上的“霸权兴衰”现象只是一种历史认识的“幻象”，其背后差异深刻的形成机理和文化意义表明每一个所谓的兴衰周期都是不可类比的。

① Mark Rupert, *Producing Hegemo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7.

② 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第105页。